

■ 书海钩沉

读书与爱国

——五位数学家的中学时光

方军

谷超豪、胡和生、李大潜主编的《文章道德仰高风——庆祝苏步青教授百岁华诞文集》一书和其后出版的《奋斗的历程——谷超豪文选》一书,都收入了一张照片,这张珍贵的照片摄于1991年,是年苏步青89岁,方德植81岁,白正国75岁,杨忠道68岁,谷超豪65岁。他们是苏步青教授创建的浙江大学微分几何学派中的5位温州籍数学家,都是温州中学的校友。

自1902年孙诒让怀抱“富强之源,在于兴学”之理念创校起,就为这所学校的文化打下了“开放融通、体用相涵”的底色。具体来说,办学始终怀抱家国情怀。此其体。在制度文化上,讲求守正出新;在教师文化上,讲求和而不同;在学生文化上,讲求君子不器。此其用。就是在这样的学校文化中,五位先生的中学时光,牢牢地将读书与时代联系在了一起。他们的阅读之广泛与深入,令人叹服;他们的情怀之浓厚与炽烈,令人感动。

1 “文学、历史知识辅助我登上数学殿堂”

1915年夏,苏步青先生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温州中学。刚入校时,他喜欢看《左传》《史记》等。第一堂语文课,陈老师便布置了一篇作文《读〈曹刿论战〉》,两节课内,苏步青保质保量地完成了,老师的评语是:有《左传》笔法。但陈老师还是找来了苏步青,问:“这篇文章可是你自己写的?”苏步青肯定地回答了老师,并说明此文模仿了《左传》的文章笔法。陈老师要他背诵《左传》中的一篇文章,他背诵如流。陈老师力荐给洪彦远校长,洪校长大加赞赏,并贴到学校布告栏作为范文。历史老师是举人出身,他也是位惜才之人。有一次,老举人在课堂上提问:“秦王朝灭亡的原因何在?”苏步青引经据典,并把贾谊的《过秦论》从头到尾背了一遍。老举人拈须而笑,甚至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珍藏《资治通鉴》等史书借给苏步青。

苏步青一度立志要在中学四年读完《资治通鉴》,在他读到三四十卷时,因为杨霁朝老师的到来,改变了他的主攻方向。事情发生在1916年,也就是苏步青读二年级时。第一堂数学课,杨老师竟然没有讲什么数学题目,而是大讲特讲当时的世界形势,他的话掷地有声: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,在座的每一位都有责任救亡图存!要救国,就要振兴科学,发展实业,就要学好数学。”苏步青的灵魂被震撼了,他在文章中写道:“杨老师直截了当地宣传‘科学救国’的道理。……我终于向杨老师表示:‘我想多学点数学,请多加指教。’”他常常阅读杨老师带来的科学杂志里的数学知识和习题,那些很有意思的习题把他吸引住了,过去读文史书籍的时间,几乎都用来钻研数学了。

四年求学,他从没逛过温州当时最繁华的五马街;除了生病,也从没



左起：白正国、方德植、苏步青、杨忠道、谷超豪

资料图片

在22点前上过床;寒暑假回家,白天地里干活,晚上灯下钻研。“为了证明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这一定理,我采用大同小异的二十种方法,并写成一份论文,被送到当时浙江省的一个学生作业展览会展出。”中学时代,苏步青已颇具研究精神了。除了杨老师,陈叔平、洪彦远对苏步青的影响一样巨大。温州中学80周年校庆时,苏步青手书贺诗一首,其中有“岷老(指洪彦远)怜余如幼子,叔师训我作畴人”的诗句。回忆中学时光,苏先生曾说:“深厚的文学、历史基础是辅助我登上数学殿堂的翅膀,文学、历史知识帮助我开拓思路,加深对数学的理解。以后几十年,我能吟诗填词,出口成章,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初中时的文理兼治的学习方法。”

2 要救国就要学好科学

方德植先生1924年考取温州中学,1926年升入高中。他入学的时候,正是朱自清结束该校教职不久,他掌来的新文学火炬在这里大放光明。方德植深受新文学新思想的影响。他的数学成绩始终名列前茅,这得益于他的一套方法:一是强化对书中基本概念和定理的理解;二是训练运算的技巧和逻辑推理;三是表达清楚,让人看得懂。同时,方德植富有强烈的爱国热情,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。他与许多同学一起积极参加抗日爱国运动,夜以继日地在有关商店搜查日货,把清查出来的日货集中起来,予以烧毁。他们不畏强暴,成立了温州学生联合会,方德植当选为主席,继续组织领导温州地区的学生进行抵制日货的运动,焚烧了数以吨计的日货。当时,有一些商人通过种种渠道向他求情,但遭到了年仅18岁的方德植的严词拒绝。他的活动引起了当局的注意,自身安全受到威胁,为了继续学业,他被迫离开温州。1929年夏,他以同等学力同时考取了四所大学:南京中央大学、

上海交通大学、上海劳动大学、浙江大学。最终他选择了浙大数学系。

白正国先生1933年在浙江省初中应届毕业生会考中,名列温台考区第一,进入高中后,学习更加刻苦努力,在各部门课程中,他尤其喜爱数学。当时高中部的数学、物理、化学三门课程教科书都是英文版。白先生特别感兴趣的两本书是英文版塞尔孟的《二次曲线》和严济慈的《几何证题法》,他还自学了《微积分》与《射影几何》。1934年秋,36名高中学生组成“自然科学研究会”,该研究会“以增进科学与生活的联络,并引起研求科学之兴趣为宗旨”。其后两年出版了两期《自然科学》会刊,该刊卷头语认为:“教师若要教学生成器,须多多在课外设法,这是毫无疑问的。”白先生中学时期的研究成果《轨迹问题》就发表在这本刊物上。

据温州中学校史记载,1939年侵华日军炸毁学校,5月,学校第一次迁址,25日,初中部12个班376人迁往青田水南,以栖霞寺作为教室,借用祠宇和租用民房为生活用房;高中部6个班212人迁往村头,用旧木料兴建三层楼房一座,并租用民房为住房,以竹子搭成的草棚为教室。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,疾病来袭,疟疾、疥疮在师生中流行。但教师未因此降低教学质量,学生也未因此放松学习。

杨忠道先生是“31春”的一员,“31春”特指该校高中部创建以来第一届春季毕业的那一级学生。据校友回忆,杨先生在校时就翻遍图书馆馆藏的大学数学书籍,每道练习题都不厌其烦地逐一计算过,在校期间他撰写《8M±2次之幻方》的学术论文,以至陈仲武老师对其他学生说:你们数学有难题可以问阿道(即杨忠道先生)。陈老师还将自己珍藏的一本英文原版的微积分书交给他,叮嘱他好好读。当时为防备敌机骚扰,学生们常在露天上课。据校友美术家张树云回忆,有一天陈楚淮老师带同学们到山坡上课,因人多地少,在临时课堂中还要腾出一条通道让农民挑粪,然教师高声朗诵,同学凝神谛听,一如

平常。外面局势变动不居,同学们也随时准备迁徙,只要屁股一着地,就开始学习。

3 课外阅读为他的数学加分

谷超豪先生1938年春进入温州中学,他非常注意学习效率,争取主动。通常考试是学生最紧张的时候,他却不紧张。班里有的同学临考前还有不少疑难问题,他也很乐意解答,在这个过程中也提高自己。数学和物理是他最喜欢的课程,同时他很重视作文,写作文时常常不打草稿,课内完成。作文得了很多“优”和“优加”的评分。这跟他喜欢课外阅读是分不开的。初中一年级时他痴迷武侠小说。他的哥哥谷力虹叫他不要再看武侠小说了,介绍了3本书给他,一本是艾思奇的《大众哲学》,一本是苏联译本伊林著的《十万个为什么》,还有一本是数学的普及读物。《十万个为什么》让他学到许多科学知识,那本数学读物则提高了他学习数学的兴趣,使他开始有“概率”的概念,他还清晰地记得,书里讲到用3个9拼成一个最大的数的问题。而《大众哲学》以通俗的语言、有趣的事例,讲解了什么叫“唯物论”,什么叫“辩证法”,这对谷超豪思想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高中时谷超豪读过一本叫《数学的园地》的课外书,让他接触到微积分的初步概念,这也让他对数学越发感兴趣。谷超豪回忆说,高中语文老师董朴庵“除教课外,还教我们读太史公的《史记》,我们学了《史记》里的许多历史故事,印象十分深刻”,“深深为司马迁优秀、悲壮的文笔所感动”。词学大师夏承焘来学校兼课,虽然不教谷超豪所在的班级,但他和一些同学还是有可能会去旁听,“我听过他对杜甫的《月夜》和苏轼的《临江仙》的讲解。经过他一指点,简朴的语言所蕴藏的深沉的感情和意境便深深映入我的脑海,回味无穷”。那时,他常常自己阅读《唐诗》和《庄子》的部分篇章,对古典文学著作非常喜爱,“中国古典文学的潜移默化,对于我的数学思维,也许已起了一定的作用”。

谷超豪还是学校“五月读书会”的重要成员。读书会诞生于1939年春夏之交,是当时校内组织规模最大、活动时间最长、具有深远影响的一个进步读书会。那里有马恩列斯原著,毛泽东的《论持久战》等经典著作,左翼作家的文艺作品等。读书会的活动始终与现实的革命斗争紧密结合。1940年3月,谷超豪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那时他还不满14岁。他忘不了少年时代所经历的家国之痛,62年后,他仍清楚地记得1937年日本侵略者的18架飞机从头顶飞过。他忘不了人生起步,大哥指路,在《悼念大哥谷力虹同志》一诗中写了大哥指导他阅读《大众哲学》和《论持久战》的情景,情真意切。从诗题中就可以看出,血缘亲情和革命感情的交织交融。

(作者系浙江省特级教师,任教于温州中学)

■ 著译者说

我为何要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

梅杰

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,并非没有先行的探索者,已故学者、我的恩师刘绪源先生的《中国儿童文学史略》就是一部可读性极强、充满真知灼见的著作。笔者受教十年,获益良多。这部堪称突出的一家之言的中国儿童文学史,对文本的精辟解读是其最大长处,但儿童文学史实则不够丰富,从中难以见出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基本经脉,且这部著作并未写完。受恩师刘绪源先生的启发,我不揣浅陋,斗胆“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”。这算是近缘。

其实,为何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,如何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。要说如何重写,先说重写的立场在哪里,这将直接决定了重写话语的姿态。我是站在个人立场,站在儿童文学本身的层面来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。我长期从事梅光迪与学衡派的研究,他们信奉的新人文主义学说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,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,让我明白对历史的言说,完全可以采用个人化的立场,这种方式可能更能可以揭示历史的真相,而在未来产生影响。例如,梅光迪在他的中国第一部《文学概论》中宣称文学是“非进化”的观念,就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视角。关于梅光迪与胡适之间的“胡梅之争”,在不同的史家那里也有不同的描述。个人化的真实表达,无论偏颇与否,都显得弥足珍贵。“不以成败论英雄”,历史研究没有势利眼,站在个人立场言说历史,是我一直主张的,它们也诱发了我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冲动。二十年来,我长期研究废名、梅光迪、喻血轮、许君远、朱英诞等人,他们原本在现代文学史上若隐若现,最后终被拭去历史的尘埃,大放异彩。这些应该都属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“重写现代文学史”工作的一部分。这些努力,算是为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提前做了一番学术训练,这个经历也让我深深明白史料挖掘的重要性。

采用史料来说历史,这只是一种呈现方式,不能称作历史观。史料本身就是证据,由它来叙述真相,比用自己的话来论述更有力。这是我治文学史的一点心得。当我于2008年进入儿童文学出版领域后,我秉持打造“人文文学”的出版理念,有意将儿童文学出版工作与文学史的重写相互结合起来。以《中国儿童文学经典怀旧系列》为例,我在编后记中写道:“……深入突出两点:一是以儿童文学作品为主,二是深入挖掘现有中国儿童文学史没有提及或提到不多,但比较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品。所以这套‘大家小书’,颇有一些《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参考资料丛书》的味道。”这套书体现了我在钩沉辑佚和版本选择方面的努力。其中,我下力最大的的是推出了丰子恺、林海音、老舍、凌叔华、谢冰逵、废名、郑振铎、吕伯攸、俞平伯、黎锦晖、苏苏、范泉、一叶(叶刚)等作家。他们现在大都也成了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着重需要展现的作家。

在注重儿童文学史料的挖掘之外,我还尤其注重儿童观、儿童文学观、儿童文学教育观的一以贯之。换言之,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,不只是挖掘作家作品,还原历史原貌,还要赋予文学史以无形的精神风骨。在十多年编选、出版儿童文学作品的生涯中,我的儿童文学观也更加成熟,并经历了从坚持儿童本位论,到此基础上提出了“泛儿童文学论”的发展过程。在“编学相长”的过程中,无论是对儿童文学史上作品的挖掘,还是对儿童文学理论文献的整理,都进行了比较充分、系统的爬梳,让我对中国儿童文学形成了一个整体观。儿童本位论让我拥有了重要的文本评价标准,泛儿童文学论则让我能够包容和理解更多作家作品。这两种略有差异的儿童文学观,后者以前者为基础、依托,共同形成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——审美的与历史的原则相结合,二者不可偏废。既要突出文本的审美价值,又要兼顾和尊重客观历史,才能写成一部立得住、信得过、经得起考验的文学史著作。

儿童本位论的命运,是中国儿童文学命运的一面镜子,也是评判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。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无数事实证明,坚持和弘扬儿童本位论的时代,儿童文学就容易出现佳作。而批判、背弃儿童本位论的时代,儿童文学就佳作寥寥。疏离、背弃儿童本位论,就不容易产生健康的儿童文学思潮,更不利于建立多样化的儿童文学范式,儿童文学就有可能“歉收”。可以说,儿童本位论是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一大核心思想。

此外,我还将从中国儿童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史、当代文学史相结合的角度,进行打通式探索,这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。儿童文学有自己的特殊性和独立性,但它毕竟是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一部分,适当结合起来,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背景和视野下,观照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,应当是非常有必要的。比如,现代文学何以是“现代文学”和“新文学”,这不仅仅因为它是“人的文学”“平民的文学”“革命的文

学”,更因为它出现了“儿童的文学”,这是古代所没有的新的文学。儿童文学的诞生,丰富和深化了“新文学”的深刻内涵。

在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时,我还紧紧抓住儿童文学的内在矛盾:儿童性与伦理性的矛盾。可以说,对这一矛盾的观察,贯穿在整个重写脉络中。比如,茅盾、郑振铎为何没有走上艺术的儿童文学创作之路?又如,沈从文、巴金、老舍三大文豪为何在儿童文学门槛前败下阵来,而不得入其门?这些只是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一些粗浅感受和想法,所做的也只是初步的探索和尝试,肯定有很多不足和有待完善之处,希望更多关心中国儿童文学史的读者批评指正。

(作者系儿童文学研究者)

■ 书人书事

读书,让我们比从前更好

陈俊江

胡翼青教授粉丝众多,我是其中之一。与他的学生“胡椒粉”有点儿不同的是,我多年前通过阅读《中国教育报》“认识”了胡老师并慢慢成了朋友。先说说我手机里珍存的一张照片吧,因为这张照片从一个角度记录了胡老师的影响力,也见证了我俩的友情。照片的内容是2018年8月南京一家报纸关于高校新生开学的新闻页面。这个新闻报道了一个饶有趣味的细节,盐城中学两名同桌女生,考取南京大学同一专业,问起他俩对南大的最初印象,两人异口同声说出了胡翼青教授的名字,他俩高中时听过胡教授的讲座,受益匪浅,从此心怀南大,终于梦圆。

看到这个报道,我与胡老师都很开心,我们的喜悦源自对教育的共同理解。什么是教育?教育不是灌满一桶水,而是点燃一把火。那天,我们聊了很久。

两名女生所说的讲座是前几年的事情了。我校有个文化传统,为响应4月

23日“世界读书日”,每年春季都会组织学生的读书活动,活动中经常会邀请专家前来讲学。2016年春暖花开时节,在筹备“读书节”活动中,我们邀请南大胡翼青教授来校讲学。请胡老师讲学的理由简单却充分,他曾入选《中国教育报》2013年度“推动读书十大人物”。这个全民阅读推广品牌始于2004年,很有影响力。倾听“读书人”的读书故事,某一天我就在《中国教育报》上“邂逅”了胡翼青教授。他在大学讲坛倾力营造读书的氛围,他在学子心田热心播撒读书的种子,他倡导“用读书启蒙学术思想”,他所主持的“南大胡翼青读书会”,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,已成为南京大学人文科学学生培养的前沿学术阵地之一,甚至影响到周边高校的学生。

胡老师以“读书”引领起初有些懵懂的大学生开启学术梦想,这是工作中的一个创举,尤其是他多年寂寞中的执着坚守令人感佩,我对他的教育理念心有戚戚焉,他注重对学生的唤醒与鼓舞。他的读书会的特征更在于表达,读后感的交流中充满了质疑、交锋与争论,这就让“读书”这件看似简单的事情得以升华——激发学生思考,培养思想者。

胡老师自己热爱读书,有独到的阅读体验与感悟,有自己的品牌“读书会”,他还是国家级媒体推动公众阅读的明星人物。在“阅读节”之际,邀请胡老师来校跟学生们面对面聊聊读书,不正是他们的幸运吗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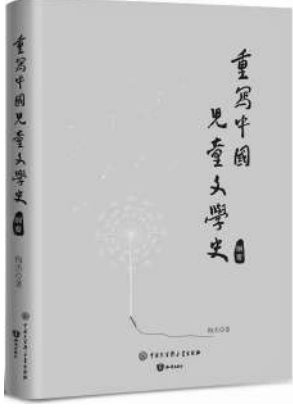
《与世界伟人谈心:论读书的四种境界》,胡老师一开讲,果然不同凡响。他说,要立志为兴趣而读书,更要为独立的思想而读书。读书,就是成长,就是心智的不断提升。通过阅读与大师进行心灵的对话,在与人类的伟大思想进行心灵对话中,建构自己的心灵。读书可以把过去的心灵、现代的社会实践与自己关联在一起,帮助自己成为思想者。

胡老师的演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在当天的微信朋友圈里,我写道:“这半天将会成为我经常回味的时光。”的确,至今

我还时常想起当时的氛围。可容纳千人的学术报告厅座无虚席,连后排都站满了闻讯而来的师生,大家以阵阵掌声回应教授的精彩演说。胡老师长于雄辩,纵横捭阖。他的声音并不很大,但睿智幽默的话语富有穿透力,加之讲话时身体微微前倾,感觉他有一种凝聚力把偌大个会场融合成三五知己抵掌雄谈。学生们听得眼神发亮,年轻的面庞写满了兴奋与钦佩,恨不能立马读破万卷书。

原本中午放学就结束的讲座,因学生们高涨的热情与浓厚的兴趣,其提问互动环节一直延续至午后。这次讲座也让我与胡老师结下了友谊,以前我在报纸上“追星”,现在我在微信中讨教。2018年秋天,我又邀请胡老师来校讲座。讲座前一杯清茶,坐而论道,闲谈甚欢。我说我一直记得教授的话:读书,让我们比从前的自己更好!我拿此言指导我的学生,也用以自我勉励。我时时提醒自己,教师能教给学生的知识是有限的,重要的是启迪思考,教育有时就是播下一粒种子。

(作者系江苏省盐城中学教师)



梅杰 著
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